

鲁迅事迹考

林 辰 著



I210.94/72

鲁迅事迹考

林 辰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一 年 · 北 京

鲁迅事迹考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83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4 $\frac{1}{2}$ 插页 2

1981年9月北京新1版

1981年9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5,000

书号 10019·3190

定价 0.36 元

孙 序

从鲁迅先生去世到今年十月，已经是整整的十周年了。

他的生前友好，和国内外敬仰爱慕他的万千青年，在这整整十年以来，如何以他的思想学术事业为根柢，从而发扬光大到如何宏远渊深的地步，这问题我此刻不准备述说。

这十年除了首尾两年以外，当中的八年，全民族正在与日本黷武主义者搏斗中；鲁迅先生的生平事迹，当初也是东一鳞西一爪的，经过这八年的长时间，不仅组织不成片段，连一鳞一爪也不免被淡忘了。这是严重的遗憾，不只是他的生前友好和国内外万千青年的，也是整个国家民族整个世界人类的。

林辰先生的《鲁迅事迹考》，却给我们减去了不少遗憾，增加了不少慰藉。全书共计论文十篇，从题目看，就知道每个题目都与鲁迅先生整个传记有关，整个传记就靠数十百篇这样的论文拱卫着。

传记作者必须对于材料有广博的知识，有的是他要选取的，有的是他要做旁证的，有的是他必须知道但未必有选取价值的。这三类材料，在这拱卫传记的数十百篇论文中，必须尽量的罗列着。林辰先生这十篇论文里面，就包含了这三类材料。例如鲁迅先生历次的演讲，对于整个传记也。

许并不重要，传记作者可能不加选取，但是他必须有此知识：这便是第三类。又如章门诸子的事迹，并不算传记的直接材料，但传记作者必须拿它作为旁证；这便是第二类。至于与章太炎的关系，归国的年代，赴陕的讲学，曾否加入光复会，组织文艺会社等等，便都是第一类重要材料了。

罗列材料以外，便是方法的说明。传记工作的初步条件，只是方法的细密与谨严。等到传记写作的时候，不能再有方法的说明了。林辰先生这十篇论文，都代表了极细密谨严的方法。无论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排列材料的方法，辨别材料真伪的方法，都是极细密谨严的。在《论〈红星佚史〉非鲁迅所译》一文里，记述作者研究方法的辨证的发展，因而材料的排列也依着这辨证的过程，最后才把《红星佚史》译者自己所作的一篇《〈发须爪〉序》介绍出来作为铁证，断定《红星佚史》绝非鲁迅所译。在《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》一文里，因有“曾入”与“不曾入”两派的意见，作者仍以辨别材料，排列材料这两种方法的骨干，再用他那敏锐的思考，勇敢的推断，把这个问题稳稳妥妥地解决了。这几种方法，既细密又谨严，供给将来的传记作者一个极可宝贵的参考。无论这传记作者是林辰先生自己也好，或是另一位也好，有了这样细密谨严的方法，决不会再写出没有价值的传记的了。

我私心希望这位未来的传记作者就是林辰先生。自然，说得广泛一点，凡属鲁迅先生的生前友好，和敬仰爱慕先生的万千青年，心头都有一篇或详或略，或粗或细的鲁迅先生

的传记，但是放在心头和写在纸上似乎确是两件事。一旦动笔，即刻感到材料不够，印象模糊。因此我自己就是林辰先生所作考证论文的一位爱读者。

林辰先生如果能再继续写作这类考证论文若干篇，即使一时没有传记，我们读了这样细密谨严的论文，其快乐也不会下于阅读整本的传记，至少使以后的传记作者省却许多考证的工夫了。

孙伏园

一九四六年，七月二十八日，在缙云山

目 次

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·····	1
鲁迅与章太炎及其同门诸子·····	13
鲁迅归国的年代问题·····	26
鲁迅赴陕始末·····	30
鲁迅北京避难考·····	38
鲁迅与文艺会社·····	46
鲁迅与狂飙社·····	73
论《红星佚史》非鲁迅所译·····	88
鲁迅的婚姻生活·····	92
鲁迅演讲系年·····	106
后 记·····	125
后记二·····	127

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

“清的末年，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，南京政府一成立，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，便亲密的说道：‘我们本来都是“草字头”，一路的呵。’”

这是《华盖集·补白》篇中的一段。就由于有这类冒牌的投机取巧之徒，使得本不会向人自炫的真的“草字头”，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，更加讳言自己的革命经历。象这段文字的写作者鲁迅先生，便是这种人中的一个。

当鲁迅留学日本时，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夕。在那如火如荼的东京留学界的革命活动里，鲁迅也实际的参加了政治组织，成为光复会的一员。光复会成立于一九〇四年冬，是清末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和会党分子所组织，主要的领导者为章太炎、蔡元培和陶成章。它的会员，以浙江人为最多，鲁迅亦为浙东人的参加者。但他后来，无论在文字上，在口头上，都从未提及此事，故世间知道的人极少。直到他逝世以后，一九三七年，许寿裳先生在《鲁迅年谱》里，才把这件湮没了将近三十年的事，郑重地提了出来：

“民国前四年（清光绪三十四年，戊申，一九〇八年）二十八岁。

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，为光复会会员，并与二弟作人译

由这，我们才知道了鲁迅生活史上的这一件大事，更清晰地寻出了鲁迅后来所沿以发展的思想行为的早年的线索。这在我们对于这位伟大作家的认识和研究上，实在是极其重要的事情。

然而，却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。值得注意的是：这人又正是鲁迅的二弟（！）周作人。《年谱》民元以前用阴历记载的部分，原是许先生就周作人所记增订而成，周在原稿内即未载入光复会事。在《关于鲁迅之二》里，他更以正面的坚定的语气，积极地加以否认：

“但他（指鲁迅）始终不曾加入同盟会，……他也没有入光复会。……以浙东人的关系，豫才似乎应该是光复会中人了。然而又不然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我不知道。”（《宇宙风》第三十期，后收入《瓜豆集》）

因为这正相反对的两说，遂致研究者纷纭莫定，或从许说，或从周说。前者如平心先生，他在《论鲁迅的思想》一书里，便据《年谱》肯定鲁迅为光复会会员，说：

“鲁迅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猛烈攻击者，是民主政治制度的热烈追求者，因此他在辛亥革命时代，对革命怀着渴望光明似的期待，并且一度参加过光复会。”（页七二）

“当时孙中山，章炳麟等所推动的民族革命运动已经震动全国了。进步的青年都卷入在革命的浪潮中。鲁迅在发表上述论文（按指《摩罗诗力说》）的次年（一九〇八年），即‘从太炎先生炳麟学’，并且加入了光复会。”（页一九二）

又如欧阳凡海先生，他在《鲁迅的书》的第五节里，也说：

“这年(按指一九〇八年)豫才不但努力翻译新文学，并且直接加入光复会为会员。推翻满清的革命，到这几年已经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概，……革命的怒潮已向着每个角落里激荡，是在这样的时侯，豫才便也被卷入光复会里去的。”(页七九)

还有胡风先生，在《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的》一文里，也说鲁迅曾“加入了光复会”。在附注里，更举出他和鲁迅的一次问答：“周先生加入过×××(原文。当指同盟会)没有？”“没有，我加入的是光复会，不过这件事没有人知道……”(《群众》八卷十八期，后收入《在混乱里面》)这样，除了《年谱》之外，又多了一项直接的材料了。

但另一方面，也有意见与周作人相近的人。如王冶秋先生，在《民元前的鲁迅先生》一书内，便这样说：

“鲁迅先生这一时期除了文艺以外，因出入民报社的关系，认识了许多同盟会的人，而与徐锡麟等同组光复会的陶焕卿(成章)，也因徐刺恩铭案亡命来东京，因为同乡的关系，常到先生的寓所或民报社谈天。……可是结果先生既未加入同盟会，似也没有入光复会。(《年谱》中作曾入光复会，知堂文中说并未加入，未知孰是？)”(页一〇八)

这里虽未完全肯定，但语气上，是倾向周说的。(他说“似也没有入光复会”，不说“似曾入光复会。”)所以下文接着便说：“他对政治组织没有实际的参加。”(页一一二)这显然已是肯定地赞同周说了。

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？我的意见以为《年谱》所说“为光

复会会员”，是符合事实的。

鲁迅之赴日本，是在一九〇二年。自此以迄一九〇九，留日计凡八年。在这期间，国内革命运动，风起云涌，武装举义，连年不绝；而东京以活动较便，途程较捷等关系，当时简直成了革命的策源地。排满的各种集会、讲演，时有举行；各种书报，纷纷出版。革命空气，弥漫整个留东学界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本来就是热情、睿智，旧学新知，都已具有根柢的鲁迅，又得接触各种人物，阅读各种书籍，感故国的飘摇，受异邦的刺激，在思想行为上，自然会发生很大的影响。他在出国以前，即已接受了“维新”的思想，到这时候，便自然的进了一步，接受了民族革命的思想。他遥对着“风雨如磐”的故国，立下了“血荐轩辕”的誓言和决心。他宣扬与波斯王大战的斯巴达人的战斗精神和爱国主义；讴歌“立意在反抗，指归在动作”的拜伦、普希金、裴多菲……诸诗人的“摩罗”精神。他之决意学医，是因为“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”，预备卒業回国，假医学“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”。他之放弃医学，改习文艺，是因为后来认清了“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国民，……第一要着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”，而文艺正是善于改变精神的利器。他介绍域外文学，特别偏重俄国和被压迫民族的作品，是想用那些叫喊和反抗的声音来激励处境相类的自己的民族。他往听章太炎讲《说文解字》，目的并非专为获取知识，却是“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”。除了这些荦荦大端以外，还有一些细节，如徐锡麟、秋瑾被杀的消息传到东

京后，人心愤怒，同乡会开会追吊，鲁迅也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清政府的无人道。他热烈发言，还坚决地和不主张发电的人争论（《朝华夕拾·范爱农》）。有一次，他从仙台回东京，特地中途在水户下车，去凭吊明末遗民朱舜水的遗迹（见许寿裳：《王著〈民元前的鲁迅先生〉序》）。而且就在留日期间，他便毅然将发辫剪掉了。由这种种，可见鲁迅这时的一切言行，莫不与民族主义精神息息相通。在那时间，在那地点，他实在是有可能实际参加政治组织的。

这里，还值得特别述及的，是鲁迅当时所往还的那些人物。他在努力读书、作文、翻译以外，也和别的留学生一样，一有功夫，“就赴会馆，跑书店，往集会，听讲演”（《且介亭杂文末编·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》）。他这时的交游自然是极广的。但他对于那些只知道在会馆里“咚咚咚地”“学跳舞”（《朝华夕拾·藤野先生》），“关起门燉牛肉吃”（《华盖集续编·杂论管闲事·做学问·灰色等》）的无聊之徒，很看不惯。他所与交往的多是光复会、同盟会中人。如章太炎，是光复会的领袖，道德文章，革命勋业，彪炳一世，鲁迅曾从他问学，这里不用说了。章以外有陶成章，字焕卿，会稽人，光复会的中坚分子，与徐锡麟同为大通学堂的创办人，在江浙会党中极有力量，是清末革命史上重要人物之一。他与鲁迅往还颇密，后来鲁迅在所写的文字中，曾经一再提到他。其一，在《华盖集·补白》内：

“徐锡麟刺杀恩铭之后，大捕党人，陶成章君是其中之一，罪状曰：‘著《中国权力史》，学日本催眠术。’（何以学催眠术就有

罪，殊觉费解。）于是连他在家的父亲也大受痛苦；待到革命兴旺，这才被尊称为‘老太爷’；有人给‘孙少爷’去说媒。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杀了，神主入祠的时候，捧香恭送的士绅和商人尚有五六百。直到袁世凯打倒二次革命之后，这才冷落起来。”

其二，在《华盖集续编·为半农题记〈何典〉后作》内：

“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，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，穷得不堪，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，教人催眠术以糊口。有一天他问我，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？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，求助于药物了，其实呢，在大众中试验催眠，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。我又不知道他所求的妙药，爱莫能助。两三月后，报章上就有投书（也许是广告）出现，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，以此欺人，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，所以通缉他的时候，有一联对句道：‘著《中国权力史》，学日本催眠术。’”

前者因有感于那些“漂亮的士绅和商人”的冒充“草字头”，因而联想到陶的真正革命；后者由刘半农的印《何典》而被“正人君子”笑骂，联想到陶的“教人催眠术以糊口”而被清政府通缉。语句之间，是那么充满同情、亲切、敬佩，可见两人在二十年前的交谊之笃。周作人在《关于鲁迅之二》里，也有几句提到陶成章，可供参看：

“当时陶焕卿（成章）也亡命来东京，因为同乡的关系常来谈天，未生大抵同来，焕卿正在联络江浙会党，计划起义，太炎先生每戏呼为‘焕强盗’或‘焕皇帝’，来寓时大抵谈某地不久可以‘动’，否则讲春秋时外交或战争情形，口讲指划，历历如在目前。尝避日本警吏注意，携文件一部分来寓嘱代收藏，有洋抄本一，系会党的联合会章，记有一条云：凡犯规者，以刀劈之。又有空

白票布，红布上盖印，又一枚红缎者，云是‘龙头’。焕卿尝笑语曰：‘填给一张正龙头的票布如何？’数月后，焕卿移居，乃复来取去。”

由此不难想见陶成章在东京时的活动情形和他与鲁迅的关系。又有龚宝铨，字未生，嘉兴人，亦光复会的中坚分子，与陶成章、徐锡麟等关系极深。他是鲁迅听章太炎讲学时的同学，上引周作人文说“未生大抵同来”，足见他们常相过从。那和徐锡麟相约同时举义而被杀的秋瑾女士，山阴人，光复会会员，亦与鲁迅熟识。许景宋先生在《民元前的鲁迅先生》一文内，曾说：

“秋瑾女士，是同时的留学生，又是同乡，所以也时常来访。她的脾气是豪直的，来到也许会当面给人过不去，大家对于她来都有点惴惴欲逃，但是假使赶快款待餐饭，也会风平浪静地化险为夷。那时女留学生实在少，所以每有聚会，一定请她登台说话，一定拚命拍手。”（《抗战文艺》六卷四期）

这末尾所说，大约是鲁迅当时在集会里常见的实情，他在《而已集·通信》中也曾略略提过。又许寿裳，字季莪，山阴人，与鲁迅一同就学于章太炎，为鲁迅的终生好友，亦光复会会员。此外还有陶冶公、陈潜等人。陶初名铸，字望潮，后以字行曰冶公，会稽人，成章即其侄子。在东京与鲁迅共习俄文，后在长崎从俄人学造炸药（周作人：《关于鲁迅之二》），辛亥时曾率人攻打上海制造局（见《文坛》二卷一期陶著《悼鲁迅》诗前王冶秋按语）。陈字子英，山阴人，曾与徐锡麟在东湖密谋革命，徐殉难后，逃往日本（周作人：《关于

范爱农)),亦鲁迅学俄文时同学(《关于鲁迅之二》)。光复后,绍兴少年们办《越铎》报,曾借用他和鲁迅的名字作发起人(报名据周作人:《关于范爱农》)。两人也都是光复会会员(据许寿裳先生复作者函)。这些人,在学识、性情、年龄上,各有殊异;和鲁迅往来的时间,有久有暂,情感也有深有浅;但他们却有一点共同的地方,就是都是光复会的会员。(同盟会成立后,也有加入同盟会的。)从鲁迅所交往的这些师友,大约也可窥察出他当时是怎样的一个人罢。

再就归国以后的事实看,他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兼监学时,学生们便知道他“和同盟会及徐锡麟有过关系,……是革命党”(胡愈之:《我的中学生时代》)。不久,武昌起义,革命的风暴也卷及绍兴,这时鲁迅本早已于暑假中由绍兴府中学堂“走出”,但因时值光复,学校监督沈某又已辞职,校务无人负责,学生乃推举代表,坚请前任监督陈瀚和鲁迅回校主持,于是鲁迅又回校任监学数周(见《绍兴中学五十周年史稿》,一九四七年三月编印)。这时绍兴市上人心浮动,他曾召集全校学生组织了一个“武装演说队”,在市面上游行一通来镇静人心,对于绍兴的光复帮助很大(参照景宋:《民元前的鲁迅先生》;孙伏园:《惜别》)。在绍兴光复以后,他便出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。这时绍兴的总督为王金发,本“绿林大学出身”(见《范爱农》),也是光复会中人,与徐锡麟、秋瑾、陶成章、竺绍康等同谋革命;“和鲁迅先生也是朋友”(见前揭景宋文),鲁迅在《范爱农》和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二文里,曾提到过他。但较详细的是周作

人的《关于范爱农》：

“王金发本在嵊县为绿林豪客，受光复会之招加入革命，亦徐案中人物，辛亥绍兴光复后来主军政，自称都督，改名王逸，但越人则唯知有王金发而已。二次革命失败，朱瑞为浙江将军，承袁世凯旨诱金发至省城杀之，人民虽喜得除一害，然对于朱瑞之用诈杀降，亦弗善也。”（《宇宙风》六十七期，后收入《药味集》）

鲁迅怎么会和这样的一个人“是朋友”，而且会在他当都督时任校长呢？这不会和光复会毫无关系。尤可注意的是，“他的得任校长，是当局对前任校长不满意，要他来继任之后，可以从办交代中，找出前校长的错处，做一个堂堂的处理的”（景宋：《民元前的鲁迅先生》）。这前任校长是杜海生，当局不满意他的原因，“是一般青年革命者，认为杜先生在秋先烈瑾殉难的时候，站在可以援救的地位而不援救”（孙伏园：《惜别》）。既然其中有此情节，那绝不是非光复会会员所能出任校长的。还有，后来绍兴少年们办《越铎》报来监督王金发，为什么又要借用鲁迅的名字作发起人呢？这恐怕不只在校长的地位，主要的还是他的革命事迹，使那些少年们发生景仰，进而以为他的名字可使王金发见而知所检束的吧。至于他后来常常用那么亲切的笔触去述说那“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”，他对章太炎的终生敬礼不衰，我想，这都和入光复会有关，决不仅是什么单纯的“同乡”或师生的关系所能解释的。

至于在否认者的一方面，论据实在极不充分。周作人只说：“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我不知道。”毫无道理，不在话下。

王冶秋先生则举出鲁迅自己所说的：“革命的领袖是要有特别本领的，我却做不到。”以及《两地书》中的几句话来作为“原因”。由引证的完全相同上看来，王先生的结论，显然是接受了许景宋先生的影响而得来的。原来许先生在《民元前的鲁迅先生》一文内，有一段道：

“（鲁迅）对于革命的运动，因着自然的耳濡目染，虽则知道得很清楚，似乎还没有肯参加过实际行动。他总说：‘革命的领袖者，是要有特别的本领的，我却做不到。’有一回，看见某君泰然自若地和朋友谈天说地，而当时当地就有他的部下在实际行动着丢炸弹，做革命暗杀事情。当震耳响声传到的时候，先生想到那实际工作者的可能惨死的境遇，想到那一幕活剧的可怖，就焦灼不堪。的确是这样脾气的，他对于相识的人，怕见他的冒险（见《两地书》）。而回顾某君，却神色不变，好似和他绝不生关系的一般，使先生惊佩不置。所以他又说：‘革命者叫你去做，你只得遵命，不许问的。我却要问，要估量这事的价值，所以我不能够做革命者。’在《两地书》中，先生也曾说过：‘凡做领导的人，一须勇猛，而我看事情太仔细，一仔细，即多疑虑，不易勇往直前；二须不借用牺牲，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（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），也就不能有大局面。’这就是说明他之所以终生是一个思想领导者而不是实际行动者了。”

景宋先生这段文字，初看去很容易令人误会：以为依照她的意思，鲁迅自然是不会加入光复会了。其实，仔细想想，她的意见，绝非如此，她引鲁迅的话并非用来证明鲁迅非光复会会员。——如果她引那些话是用来作为鲁迅未曾入会的“原因”，那便将解释不通：不错，鲁迅在《两地书》里曾说过这些话；鲁迅是思想领导者而不是实际行动的领导